

(三)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体系

通过“观察—洞察—涌现”，从案例中发现中国方案并不容易，我们从全球视野、历史格局和严谨方法3个方面给出操作建议。首先，以全球化视野考察，不能“孤立封闭”。“扎根中国”并不是要切断与国际管理学术圈的联系。西方管理学从1911年开始快速发展，累积了大量现代管理思想和成果；而以工商管理学科为代表的中国管理学科则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张玉利、吴刚，2019）。中国管理学者需要通读各自研究领域的经典和前沿理论，厘清文献的基本假设和核心逻辑，以全球化视野考察中国实践，反过来基于中国管理实践构建新理论对话文献。

其次，以历史观为根基。“全球化视野”不是要忘记中国的历史。尽管中国近现代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全球管理理论从经验主义转向科学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使中国管理学者未能掌握国际话语权；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文明延绵至今，恢弘的历史和延绵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行为方式，大量中国现代企业的管理智慧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璀璨的思想。现代中国管理学者应该肩负起历史使命，不断系统和深刻总结和传播中国管理思想精髓，让其获得该有的地位。

最后，以严谨方法为依托，不能“不负责任”。扎实的科学哲学训练，掌握严谨的方法，以“负责任”的方式才能做出“真”的研究，创造出“可靠且有用的知识”（徐淑英、仲卫国，2018）。概括来说，我们认为“真”研究应该有以下4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识真山真水——认识中国管理实践的真实世界，揭示中国企业的智慧；说真话真相——采用严谨的方法呈现真实管理世界，系统刻画真实的管理逻辑；明真知真理——呈现真实可信的结论与理论，解释并指引真实管理实践；育真人真才——培养真才，解决中国真实管理问题，服务中国经济。

注释

①参见：<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us> [Accessed on 2021-4-20]。

参考文献

- (1) Meyer, K. E., 2006, "Asian Management Research Needs More Self-confiden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3(2), pp.119-137.
- (2) Mintzberg, H., 2005, "Developing Theory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in Smith, K. G. and Hitt, M. A. (eds),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35-372.
- (3) Shepherd, D. A. & Suddaby, R., 2017, "Theory Building: A Review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43(1), pp.59-86.
- (4) Weick, K. E., 1989, "Theory Construction As Disciplined Imagin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pp.516-531.
- (5) 魏江、刘洋、黄学：《非对称创新战略：中国企业的跨越（理论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 (6) 魏江、潘秋玥、王诗翔：《制度型市场与技术追赶》。《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a第9期。
- (7) 魏江、王丁、刘洋：《非对称创新：中国企业的创新追赶之路》，《管理学季刊》，2020年第2期。
- (8) 魏江、王丁、刘洋：《来源国劣势与合法化战略——新兴经济企业跨国并购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3期。
- (9) 魏江、王诗翔：《从“反应”到“前摄”：万向在美国的合法性战略演化（1994-2015）》，《管理世界》，2017年第8期。
- (10) 魏江、邬爱其、彭雪蓉：《中国战略管理研究：情境问题与理论前沿》，《管理世界》，2014年第12期。
- (11) 魏江、应瑛、潘秋玥：《创新全球化：中国企业的跨越（案例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b。
- (12) 魏江、杨洋：《跨越身份的鸿沟：组织身份不对称与整合战略选择》，《管理世界》，2018年第6期。
- (13) 张玉利、吴刚：《新中国70年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历程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 (14) 徐淑英、仲卫国：《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充分发挥案例研究方法在构建中国特色 农林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郜亮亮

推动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5·17讲话”）开启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阶段。讲话强调，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因此，农林经济管理必在构建之列。从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领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些实践创举既得到了既有农林经济管理理论的指导,又为农林经济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沃土。而且,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等新的发展实践亟需发展着的理论的指导。总之,以我国农林经济发展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农林经济管理学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支撑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的利器。“5·17讲话”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研究方法不足导致的。缺乏科学方法论意识、不能规范运用研究方法,将使研究者视实践为无物,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能力大打折扣,导致“实践孕育理论”的速度非常缓慢。总体而言,社会科学研究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方法传承。近30年,国内定量研究(主要表现为各类计量方法的运用)越来越多,并逐渐替代定性研究(主要表现为案例研究或纯文字性的论文)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两类方法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但学术界对它们的认识仍存在一些误区^①。一方面,两种传承相互否认,以计量模型运用为核心的定量研究群体认为案例研究或纯文字研究比较简单和缺乏严谨性等,而后者认为前者唯模型,缺乏故事性和过程性分析等。另一方面,不管是定性派还是定量派,即使对各自自身所认可(或引以为豪)的方法,每一派都存在认识误区和运用不规范问题:如部分定性研究群体认为纯文字的论文不必讲逻辑、不必追求严谨或者不能进行严谨的因果关系分析;部分定量研究群体认为只要论文里有数学公式或计量模型就意味着严谨了,部分群体忽略计量实证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认为其结果可以任意推广等。实际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推论逻辑上是相通的,都追求分析的严谨性,都可以进行因果关系研究等。当然,两者各有优势,如果说计量方法的优势是更严谨地识别(或验证)一个理论假说的话,那么案例研究的强项就是提出或发展出一个理论假说;如果说前者擅长于识别一对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后者更擅长于分析这对因果关系背后的运行机制和实现路径——因果机制分析;如果说前者更适合在样本同质(至少可依据某些特征归并为同一类总体)前提下对大样本^②进行平均推断的话,那么后者更擅长对一些现实中特有的且重要的个案进行深入分析和抽象推断,等等。本文认为,两种方法是互补的,可以根据研究目标及特定条件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开展研究;当然,对两种方法进行综合运用或许能让只用一种方法的研究变得锦上添花。

当前阶段,在农林经济管理研究中充分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正逢其时。案例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方法传承中最常用的方法。案例研究^③是对单个案例(或一小组案例)进行的深入研究,研究的目的——至少部分目的——是解释一组更庞大的案例(总体),或者将研究结论推广至更大一组具有相同的一般化类型的案例(吉尔林,2017)。由于其研究的问题可以是探索性的(提出新问题)、描述性的(全面系统地展现实际情况),也可以是解释性的(因果分析),因此在某些条件下案例研究更有用武之地。第一,当事物总体处于快速发展变动中时,即总体未定时,运用抽样获得数据进而开展计量分析变得不易实现,此时用案例研究方法更适合,根据现象的重要性及研究的必要性来选定研究个案(即所谓的理论抽样)并进行深入研究。第二,当事物总体中样本的空间分布分散,如一个村或一个镇或一个县等范围内都找不出几个样本时,此时用抽样方法进行抽样进而获得大样本数据的成本较大,若用案例研究深入剖析某些个案就更具现实可操作性。第三,当事物总体中的样本个数极少但特色鲜明时,如以国家为样本时,中国的发展实践具有独特性,尽管无法进行大样本跨国比较研究,但对这种独特且重要的现象依然有研究的必要性,此时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第四,当研究目标是进行因果机制(因果路径)分析时,案例研究具有突出的优势,尽管很多定量研究已开始用计量模型研究因果机制,但仍限于初步探索,还无法对机制环境及路径进行深入分析。第五,当研究目标是提出问题(如假说、理论或概念)时,就有必要用案例研究对某些具体社会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而问题提出往往从案例研究开始。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从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如果提出问题后,还要进一步进行大样本计量分析,那之前的案例分析可看作计量分析的前提环节。当前,农林经济管理发展现实也具备如上这些理论条件,案例研究方法的

运用正逢其时。下面以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随着中国农业进入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阶段,各类主体的生产效率比较就是重要的研究问题。由于小农户、家庭农场等各类主体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即生产主体的总体是未定的,而且总体结构(各类主体占比)也缺少先验信息,因此抽样的实现难度较大。而且,由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是典型的规模化经营主体,它们在空间上分布分散,在一村一镇等层面很难调研到大量规模经营主体样本,获取大样本数据的成本较大。但对这些主体的形成、变迁及现状等进行及时研究又很有必要。此时,不妨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一些典型家庭农场进行深入分析,当然也可以聚焦两个家庭农场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再如,跨区作业收割机是很重要的生产服务主体,对这种流动着的样本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显然更具优势。

例2:乡村治理研究。对第一书记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采用抽样方法获得大样本数据具有一定难度,因此可以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少数第一书记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具体比较有无第一书记或者两个不同学历背景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效率差异——这是常见的因果关系识别研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在因果关系基础上分析第一书记“为什么”或者“怎么样”产生了治理效率——即因果机制或因果路径的研究,而这正是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所在。

例3:脱贫攻坚研究。中国的减贫实践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这种独特的、复杂的,其他地区短时间内不易重复的现象是最能产生新理论的沃土,需要用案例研究方法对这种扶贫模式进行经验总结,提炼新概念,产生新理论。

最后,本文想强调的是,本文并不否认以计量分析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法,只是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特别是以“提出问题”“发展理论”为主要目标的研究中,案例研究方法具有独特优势。本文提倡综合使用各种方法的思路,而且建议把主流计量经济学各种方法的核心精神吃透,并运用到以案例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中。实际上,多案例研究就是将计量分析中的匹配、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将核心变量的偏效应隔离出来等思想加以运用的实例。

注释

①国外社会科学界也一直存在认识误区(King et al., 1994; Goertz and Mahoney, 2012)。

②本文所言大样本是指样本量大的意思。

③案例研究或者案例研究方法一直存在多种定义的问题(殷, 2017)。但是,不管哪种定义,都包括如下基本要义:研究的对象是个案(但不限于一个个案);案例研究是对个案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可能用个案验证某个存在的理论,也可能发现新的理论,或者只是纯粹地展现一个个案的全面情况。本文不对相关方法的定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的东西进行细致讨论。

参考文献

(1) Goertz, G. & Mahoney, J., 2012, *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 King, G., Keohane, R. O. & Verba, S.,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罗伯特·K. 殷(Robert K. Yin):《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

(4) 约翰·吉尔林(John Gering):《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

引用格式为:王永贵、汪寿阳、吴照云、吴晓波、毛基业、戚聿东、张维、苏宗伟、朱旭峰、杨开峰、杨立华、席西民、李新春、张玉利、徐向艺、刘志阳、闫妍、魏江、郜亮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管理世界》,2021年第6期,第1~35页。